

SHI

ZHE

HONG

YI

士者弘毅

潘维◎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士者弘毅

潘维◎著

SHI ZHE HONG Y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士者弘毅/潘维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300-26708-1

I. ①士… II. ①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4368 号

士者弘毅

潘维 著

Shizhe Hong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插页 2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机缘巧合留下少许人文类的文字，又筛选了些近两年的社科类文章，今以《士者弘毅》为名结集面世，颇不易。新中国在七十年大庆前夕遭遇严峻挑战，更令人感慨万千。正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年初的深冬寒夜，写下这段文字，权为此书之序。

遭遇美国领衔的经济“脱钩”围堵，我国面临四十年未有之变局。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和世界“挂钩”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源。遇到复兴大业的最后一道门槛，我国面临七十年未有之变局。应对西方“神圣同盟”的经济冷战，倒在门槛边的概率不小。更被霸主视作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自有世界大战以来，我国从一战、二战、冷战的边缘角色变成了绝对主角。无论是否有“中国世纪”，贯穿 21 世纪的必是世界的“中国问题”。

中国经济强势崛起，是美国发动经济冷战的原因。“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盗窃”只不过是经济冷战的长期借口。威胁市

场脱钩、技术脱钩、金融脱钩、人员往来脱钩，步步为营，目标是我国官民一体的经济脊梁。举世皆知，我国视美国为友，而且呼唤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倘若美国认定其保持霸权地位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利益不兼容，会发生什么？

民族自立系于精神自强。只要精神不垮，中华民族就不会被打垮。本书编辑把书中文章分为三类：士子弘毅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社会主义的精神。

复兴大业任重道险，“士不可以不弘毅”。无雄图不足以负重，非坚忍不足以克险。我国依旧落后，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落后的总根子是人均收入还严重落后，如去年（2018年）我国以1万美元的人均GDP落后于美国的6万美元。但我们知耻后勇，急起直追。天上不掉馅饼，世上没有不犯错的政府和不付成本的成就。无数先烈、百姓，用血汗锻造出了人民共和国。七十年来，我们向富强没日没夜奔跑，渡激流、过险滩、熬饥饿、忍痛苦、历尽挫折，付出了极高代价。国在强、民在富，人民与国家共同进步。尽管家庙里不乏冤死鬼，但我们没靠侵略战争或欺负他族获取财富。看看那些在大江大海和崇山峻岭中建起来的宏伟基础设施，赞一句“厉害了我的国”，何错之有？世上没谁是“基建狂魔”。那是我们勒紧裤腰带，为子孙后代搭建的财富积累之桥，更是我族不屈不挠、独立自主的精神象征。我国而今的财富是因为搭了美国的“便车”？为什么不是美国搭了中国的“便车”？在精神上向“洋大人”跪下，并非“改革开放”的初心。

拒绝自贱、自残，文化自觉，是我们民族自立的精神支柱。

清末民初，不少士子把国家民族的不断挫败归罪于自家祖先，归罪于孔孟，归罪于秦汉以来的“专制文化”，遂鼓吹“全盘西化”、政治体制全盘西化。然而，新中国承上启下，树大根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屈不挠，“苟日新，日日新”，仅七十年就创造出举世公认的奇迹。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饥饿、愚昧、落后、挨打的中国，高速进步，成了世界霸主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奇迹又该归功于什么文化？两千多年的生存方式孕育了丰富的中华传统。而今，咒骂祖先，幻想拔着自己头发离开脚下大地，飞向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苏维埃、美利坚神话的“启蒙派”们，信众越来越稀少了。

以民为本、有容乃大，扶老携幼、守望相助，追求小康、向往大同，这种中国古典社会主义精神已传承了两千多年。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中华信奉中庸，开创了以市场和资本为工具、以社会利益为依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利益就是养小、送老的均等化，让社会凝聚为一个大家庭，也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均等化。富足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我们的精神依归。因为社会至上的精神，中华大家庭万世一系，迄今高寿两千多岁，独步全球。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士子弘毅、文化自觉、社会主义，一旦这三种精神不再，就只好为我族的大溃败而哭泣了。

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看到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廉洁奉公这三大富强要素迄今尚难有机共生，我深深寄望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党要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民迈向光明的未来；更要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在每一个居民区维护社会正义，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还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时刻检讨小事与大事的平衡，时刻警惕失去人民的信任、时刻警惕失去民心。上下同心同德，逆转社会分裂趋势，让贫富尊卑团结如一家，我国当然举世无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潘维

2019年1月14日

目录

Contents

一、高贵的精神 001

忆先师陈翰笙 003

高贵的精神 016

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023

追忆史天健 039

追忆同事李保平 043

纪念邓英淘 049

二、文化自觉 053

理想主义与大学 055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071

“西学东渐”四百年 079

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088

社科博士论文及文风 094

三、社会主义 099

中国的社会主义 101

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 108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 116

反腐败的易与难 123

以人民为中心：大事与小事，科层系统与扁平组织 126

都市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146

社会团结，国家才能富强 167

政府的理性化与官僚化 179

以小为大、以下为上 188

改革咏叹调 195

忆先师陈翰丞

一、高贵的精神

这是陈翰丞[1]先生写的两篇回忆录，写的是他童年不是，可也述及他晚年还是干什么的。记得我，第一次接触陈翰丞先生大概是在北平那会儿。刚毕业，刚就业，要学干点啥呢？陈翰丞才决定咱不乾。天哪，咱学的人叫啥呀，还是学人叫啥陈光远[2]的啥呢？——

陈翰丞先生那会儿是在他老家门附近的那，他问我为啥要读啥书？咱这书是啥也分的，不过我说不出来，因为咱是学那咱这个人的啥的。我们北大七七级到七八级学生已经死了

[1] 陈翰丞（1904年1月）[1]月陈翰丞先生生平事记——《陈翰丞先生追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忆先师陈翰笙*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首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已经捐了

* 本文是2004年4月13日作者在太平洋学会“陈翰笙追思会”（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上的发言。

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20年后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

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回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兹忆当年师生事，纪念翰老，为自己余生鉴，亦为那精神薪火相传。

一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九子，仅存首末两子女，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唯“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可以这样定！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八十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

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我国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唯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

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到重要的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 GRE 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俩了。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我就说：结构就是 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 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